

〈戰後初期新竹政治的活動——以新竹市參議會為中心（1946-1950）〉

吳沁昱

一、前言

隨著 1945 年 8 月 15 日戰爭結束，台灣脫離了日本的殖民統治，面對如此的衝擊，雖然此時台灣人的思考與其間的秩序與社會狀況可以再做相關的討論¹，但緊接而來的接收的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台灣的建制也引發相當大的爭議，最為明顯的即是行政長官公署的設置，若同時與其他中華民國各省來比較，可以說其將台灣的接收作為一種特殊化的統治，並且有相當的問題是，行政長官有相當的權力，集行政、司法、立法等權力及於一身，如同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²又加上當時行政長官公署，除了以所謂的「中國人」佔有多數以外³，他們更取代戰前日本人的地位，佔台灣省高級公務員絕大部分，無怪乎台灣民間戲稱

1 例如蘇瑤崇提到：「學者往往引用吳濁流小說《無花果》之說，解說這一時期（終戰至國民政府接收）是『無政府』或『政治真空』狀態，是靠「三民主義青年團」維持社會秩序，甚至於說「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也維持秩序……」。前述學者即指李筱峰、陳翠蓮都有類似的說法，但蘇氏則認為戰後至接收期間，所有的經濟、社會與治安狀況都顯示總督府依舊有效統治台灣，因此不認為政治真空期存在，並提及三民主義青年團並未維持秩序，還是煽動台灣人仇日、製造混亂的幫兇。上述論點可參考蘇瑤崇，〈「終戰」至「光復」期間台灣政治與社會變化〉收錄於《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三期（台北新店：國史館，2007），頁 46-87。蘇氏雖振振有詞反駁前列學者研究，但筆者認為其探討的問題或許應參照更多相關史料及研究，才有可能推翻前論，像吳密察即利用吳新榮日記，提到吳新榮除了組織「忠義社」作為三青團的武衛組織之外，其本身亦是三青團曾北團籌備處的負責人，因此三青團不但成為地域精英的集合，而且也有維持地方安寧的基本警察能力。因此戰後的社會及治安狀況或許可以再詳加討論，前述可參見吳密察，〈台灣人的夢與二二八事件—台灣的脫殖民地化〉收錄於《當代》第八十七期（台北：當代雜誌社，1993），頁 34。

2 鄭梓，〈戰後台灣行政體系的接收與重建—以行政長官公署為中心之分析〉收錄於《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頁 252。

3 如以總數來觀察，行政長官公署總職員數有 44,451 人，台灣人僅有 9,951 人，而中國人則有 28,234 人，剩下為留用日人，可以說比例有相當的差距；另外以職等來看，高級職員數（最高六級職員）台灣人有 7,526 人，中國人有 13,419 人，比例亦是懸殊，數據引用自吳密察，〈台灣人的夢與二二八事件—台灣的脫殖民地化〉收錄於《當代》第八十七期（台北：當代雜誌社，1993），頁 39。

長官公署為「新總督府」。⁴

不過會有如此的說法，可以說除了前述本身行政長官公署的體制問題外，被，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菁英分子已經有「自治」的想法，此種思考可說發源自日治時期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抗爭，⁵同時日治時期的選舉經驗，也讓台灣人民對選舉並不陌生，也因此知識分子十分關切，國民政府如何實行選舉，而戰後初期的選舉也變成觀察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的一項相當重要的指標。首先對於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有一綜合性的分析研究，為李筱峰的《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⁶，該研究分析了戰後初期的選舉以及民意代表的經歷，並認為 1946 年至 1951 年的省縣市參議員有相當大的變動，如其提出五項原因：一、參議員轉向地方行政工作。二、轉向更上層民意機關。三、行政區劃分變動。四、成員的死亡。五、因事去職。前述因素可說為戰後菁英的變動作一初步的解釋。

不過，究竟他們這些民意代表的表現如何，參議會的運作如何，以層級區分，首先是關於省參議會的議員的研究，如鄭梓的《戰後台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⁷即對台灣省參議會有相當深入及詳盡的探討，從參議會的誕生、議員組成的背景分析及流動到參議會的職權、重要提案以及決策，都有相當詳盡的爬梳。其認為雖然台灣省參議會是具有雙重過渡性質的代議機構，如其為戰時過渡到平時（依據法令為 1944 年 12 月的省參議會條例）、從訓政邁向憲政，但省參議會仍能力求突破，不僅把握預算權、發揮詢問權、爭取立法權以及參與人事權等，發揮其溝通政府與民間、中央與地方的橋梁角色，其質詢、聽證、省政考察等制度也為後來議會所繼承；但其亦有難以跨越的侷限性，其組成份子為地主及士紳階層，因此亦免不了為其階級意識所牽絆，並在議事功能上欲振乏力。鄭梓的研究可說相當具體而細微的整理出台灣省參議會的狀況。

而有了前述研究成果後，隨著台灣史研究的蓬勃，也出現對於後續針對區域性的參議會研究，如張炎憲、高淑媛的《混亂年代的台北縣參議會（1946-1950）》⁸，以縣參議會議事錄和縣參議員的口述紀錄為主，論述台北縣參議會的歷史變革。但其認為台北縣功

4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1986 初版、1987 三版），頁 186。

5 台灣人從 1920 年開始的政治社會運動，只有自治這項訴求延續至 30 年代，雖然這並非起初的目標（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仍有其影響。相關論點參考：何義麟，〈自治的理想與實踐—戰後初期台灣自治運動之轉折〉收錄於《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第七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4），頁 9。

6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1986 初版、1987 三版）。

7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1986 初版、1987 三版）。

8 鄭梓，《戰後台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台中：著者自刊，1993 增訂版）。

能不彰，有下列主客觀因素：一、縣參議會暫行條例的職權限制。二、二二八事件對縣參議員政治熱情的打擊。三、縣參議員本身條件的限制。而客觀因素則是財政困難。簡單來說，台北縣參議會實受限於其環境，不能發揮反映民意、監督政府的功能，但仍能保存台灣民主政治理念的「香火」。

另外鄭志敏，〈從「市參議員」到「悽慘議員」——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⁹則是針對性就戰後高雄市參議員進行討論，其除了認為市參議員並非都是從區（或鄉鎮）民代表會的代表間接選出¹⁰，而是透過區公民直接選舉產生外，主要認為，在二二八事件以前，市參議員對於當時的社會狀況提出相當多的建言，像參議會對於糧荒與米價的問題態度相當強勢；再者，如郭國基也明白指出連謀對於日產的交易處理相當不恰當，而雙方略有衝突。但二二八事件以後，高雄市參議員歷經風波，而不敢在老虎嘴上拔鬚，只能配合當局相關政策，而後將其職權轉交給市議會，完成其歷史傳承的任務。

而王御風，《近代台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1920—1960）》¹¹則是重新釐清從1920年至1960年期間高雄市議會整體的狀況，其中談及戰後高雄市參議會的情形，同以二二八事件為區分，認為原本高雄市問政狀況犀利，但後面則是僅維持基本功能；但其指出，其實戰後與日治時期的高雄議會已有斷層與過渡，雖二二八造成台籍菁英的消失，但非唯一影響議會變動的因素，每一次的變動（從協議會到高雄市議會）即會造成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斷層，可以說其與陳明通對於戰後初期菁英流動的解釋不甚相同。¹²

前述研究可以說為除了相當清楚的描繪了戰後初期菁英活動的圖像，更試圖提出影響其流動的因素。雖然前述關於戰後菁英的研究已有相當的成果，但對於地方區域中的菁英或許可以再做一些更細緻的研究，¹³而能更具體探討出不同地區的菁英在戰後面對國民政府

的態度是否有其差距，具體來說，是否他們有不同的政治參與態度，也可以再做相關的剖析，如以本文欲探討的戰後新竹菁英為例，新竹市參議會從1946年至1950年期間，菁英流動率是全台最低的，如據李筱峰的統計，新竹市參議會「有始無終之人數」¹⁴為4人，與剛成立時新竹市參議會議員總額26人對應，百分比為15.38%，遠低於全台灣39.39%的流動率。¹⁵以此流動率對照陳明通其菁英流動解釋，亦難以突顯二二八事件對於新竹菁英的影響；換言之，新竹市參議會的菁英是否有其地方政治參與的特殊性，而為前述研究未能觸及或忽略，這是筆者所關注的焦點。

另外，戰後初期混亂的狀況亦值得關注，如新竹市參議會從其在1946年4月15日成立，至1950年10月20日結束，雖僅成立約4年半的時間，但卻同時是戰後台灣與現在中國史最為混亂的時期，在這期間，除了1947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外，包括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蔣中正於1950年再度復職為總統，並在該年稍後也同時爆發了韓戰，美國派遣其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才使得國民政府在台灣的局勢稍見穩定；同時為了「挽救」其政權，透過制度性的安排，一方面進行經濟上的「三七五減租」、另一方面則是實行所謂的「地方自治」，可謂「起死回生」的政治工程。¹⁶

在前述背景下，台灣較為著名的菁英其政治活動或已早先有其他研究分析，然而筆者正欲從不同面相觀察新竹的菁英如何對應，如果受到二二八事件因素的影響較小，是否有更為關鍵影響其變動的因素，都是可以再研究的地方，也藉此是否能以新竹的菁英來參照其他地方菁英的政治活動。此處筆者則欲借用呂亞力的定義，界定新竹市參議會的菁英，即是政治菁英，如其提及：「所謂『權力菁英』是指社會上少數擁有政治權力，享有龐大資源並參與決策的人……亦可稱之為政治與行政菁英……在現代社會，基本上是指重要的政務與事務官員、政黨領導人士及國會與地方議會議員。」¹⁷藉以釐清本文題目。另外，本文同時欲以政治現代化的角度觀察，如著名學者杭廷頓（S. Huntington）認為政治現代化由權威理性化、結構分化和功能專化、政治參與等三個變項互動形成。而第一、政治現代化包含權威的理性化。許多傳統的、宗教的、家族和宗族的政治權威，由世俗、民族的政治權威取代，這轉變象徵政府是人的產物，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一個具有優良秩序的社

十幾個縣市更夠把它架構起來，則提供我們一個比較有想像空間的歷史場景……」。鄭志敏，〈從「市參議員」到「悽慘議員」——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頁459。

14 其以各縣市甫成立的參議員名單與結束前的參議員名單做對照，將其差異稱之為有始無終人數。

15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頁59-61。

16 鄭梓，〈中央政府遷台初期開創「半自治制」之歷史探源〉收錄於《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四冊》（台北：近代中國，1995），頁426-427。

17 呂亞力，《政治學：從權力角度之政治剖析》（台北：台灣東華，2008），頁85。

9 鄭志敏，〈從「市參議員」到「悽慘議員」——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收錄於《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9），頁393-459。

10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頁19。

11 王御風，《近代台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1920—1960）》（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12 吳乃德、陳明通認為，戰後初期的地方政治菁英流動並未受到政權轉移的影響，甚至新政權和新的政治局面提供原先在日治時期擔任較為底層職務的菁英一個上進的機會；而影響他們最大的因素則是二二八事件以後，他們對新政權產生疏離與政治冷漠，而不再參與地方選舉，甚至高達八成的地方菁英從政治領域中消失，前述論點參考吳乃德、陳明通，〈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收錄於《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頁351-385。

13 如鄭梓評論前述鄭志敏文章提及：「高雄市參議會只是一個樣本，張館長（張炎憲）做了台北縣參議會也是一個樣本，是一個很好的範例，還有8個市，9個縣，如果8個9個縣能夠這樣大量做的話，

會，必須把最後權威的來源放在實證法律上，而人民對法律之服從超過任何義務。第二、政治現代化包含政治結構新功能的分化，和執行此功能的專業結構的發展。第三、政治現代化包含社會諸團體更積極地參與政治。¹⁸ 上述政治現代化的面向，或能有助於對新竹菁英的觀察，下面即先從新竹市參議會成立與成員討論。

二、新竹市參議會的成立及分析

由於戰後新竹市的行政區域經歷多次變化，因此筆者此處先從戰後新竹市的概況著手，並提及新竹市參議會的選舉情況。在 1945 年 10 月 25 日，國民政府接受台灣最後一任日本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後，11 月 7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台灣省州廳接管委員會組織通則」，並派郭紹宗為新竹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¹⁹ 而同月 17 日，新竹市政府成立，郭紹宗為市長，並將原來日治時期的 25 區改設成 9 區。²⁰ 12 月 6 日，公布「台灣省省轄市組織暫行規程」，設置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 9 個省轄市，新竹市面積為 100.4328 平方公里，人口有 96,701 人。²¹ 而新竹市政府下轄 9 區，設置區公所，而市政府設置於第 1 區，區之下設有里。

然而前述的設置，到了即將舉行參議會選舉之前，又有了下述的變動：在 1946 年 3 月 18 日，原屬新竹縣的竹東鎮與寶山鄉編入新竹市，並隨即於 4 月 15 日，將原來 9 區改為：東、西、南、北、香山等 5 區，再加上竹東及寶山兩區，共有 7 區。²² 不過設區的規劃實際上並未完全影響新竹市參議員的選舉，選舉仍以戰後 1945 年 12 月以來的區域規劃為選舉區域，至多併入竹東與寶山的參議員名額，以下即從新竹市的選舉情況談起：由於台灣長年為日本殖民地，未受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因此辦理民代選舉前，需照「台灣省公民宣誓登記規則」，依法定程序取得公民權，²³ 而新竹市取得公民人數可參見下表 1：

表 1：新竹市公民登記數

區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竹東	寶山	總計
男	1395	2136	2806	1759	980	1789	2007	1852	2777	2793	1059	21353
女	1395	2410	3069	2051	1038	1719	2080	1901	1586	2133	274	19656
總計	2790	4546	5875	3810	2018	3508	4087	3753	4363	4926	1333	41009
宣誓日期	2月9日	2月7日	2月9日	2月9日	2月9日	2月8日	2月7日	2月9日	2月9日			

資料來源：林水樹纂修、黃旺成監修，《台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五政事志—第一冊地方自治、行政》頁 211

以新竹市戰後統計總人口來看，全新竹市公民數約占 42%，略高於全台灣 36%²⁴。不過這僅是可以投票的公民數，實際上能獲得公職候選人的資格，則又佔全公民中的少數²⁵，而從下面新竹市參議會的選舉亦可以知道此種情況。依據「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新竹市政府應於 1946 年 4 月 15 日以前，成立新竹市參議會，並選舉省參議員。²⁶ 而新竹市政府也遵照法令，1946 年元月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於前述 2 月上旬完成，並依序成立村里民大會、選舉鄉鎮民代表及成立代表會，原來預定於 3 月上旬完成全省縣市參議員選舉，後因時間問題而改定 3 月 31 日投票選舉市參議員，各區應選名額如下表 2：

表 2：新竹市參議員各區域分配及競選名額

區別	人口數	名額	候選人數	區別	人口數	名額	候選人數
第一區	7459	1	4	竹東區	25200	3	6
第二區	11339	3	3	寶山區	10708	2	4
第三區	17000	3	10	商會		2	3
第四區	8695	1	4	農會		1	1
第五區	4825	1	3	醫師公會		1	10
第六區	7742	1	4	教育會		1	8
第七區	9439	2	6	總工會		1	7

24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頁 16。

25 如全台灣擁有公職候選人僅 36,968 人，而全台約有兩百四十萬人有公民權，足見其差距。參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編，《台灣民政第一輯》，頁 156-157。

26 〈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第六條，1945 年 12 月 16 日公布，收錄於《台灣省民意機關之建立》（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1946），頁 311。

18 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圖書，1982 初版、1987 三版），頁 46。

19 吳密察撰、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首（下）—史略》（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頁 102。

20 潘國正撰、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首（下）—大事紀》（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頁 219。

21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編，《台灣民政第一輯》收錄於《民國史料叢刊》119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頁 147。

22 吳密察撰、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首（下）—史略》（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頁 103。

23 鄭志敏，〈從「市參議員」到「悽慘議員」—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頁 400。

第八區	8656	1	6				
第九區	10309	2	4			共 26 名	共 83 名

吳沁昱重繪，資料來源：林水樹纂修、黃旺成監修，《台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五政事志—第一冊地方自治、行政》頁 222-224

從表 2 來看，雖然新竹市應選出 26 名參議員，然各區依其候選者多寡，實際上競爭程度並不相同，如有百分之百篤定當選的區域，亦有選舉相當競爭的醫師公會，因此是否能藉此觀察日後新竹派系的源起，或許有待更為深入的探討。

另外也顯示其實能擁有公職候選人的資格仍屬少數。以下則再以表 3 分析新竹市參議員其背景：

表 3：新竹市參議員名錄

姓名	性別	年齡	學歷	經歷	選出區域或團體	票數	備註
張式毅	男	57	師範學校	香山庄長、市會議員、新竹信用組合	商會	51	15 票當選議長
何乾欽	男	55	台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學校	開設明德醫院、市醫師公會會長	第三區	876	21 票當選副議長
蘇惟梁	男	51	中央大學法科	台灣省教育會理事、大東公司董事長、創辦富國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第一區	768	當選省參議員後由鄭建杓遞補
陳添登	男	48	師範學校	臺灣蓮草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市會議員	第二區	1781	
郭傳芳	男	45	師範學校	新竹州農業會農政課長、新竹煉油廠經理	第二區	867	
周宜培	男	40	中央大學肄業	茶茂商行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新竹客運常務理事	第二區	656	
駱柳村	男	34	東京工業院	新世界戲院經理、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第三區	131	
張國珍	男	43	新竹中學	書畫展覽會審查員、新竹縣農會	第三區	846	
李延年	男	51	師範學校	新大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第四區	339	

姓名	性別	年齡	學歷	經歷	選出區域或團體	票數	備註
李子賢	男	35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	新竹辯護士會副會長	第五區	468	
胡春塘	男	46	師範學校	公學校教員、保甲役員、警防團頂埔分團長	第六區	627	
曾瑞堯	男	60	師範學校	樹林頭信用組合理事、新竹街方面委員	第七區	1200	
蔡欽旺	男	41	國民學校	曾任區長、信用合作社理事	第七區	659	
楊心樂	男	42	國民學校	善經營	第八區	1420	
蔡福來	男	43	國民學校	香山庄協議會員、保正	第九區	1109	
洪王桂	男	30	漢文書房青年訓練所	香山庄役場書記、台灣竹村工業有限公司事務員	第九區	664	
盧阿桶	男	48	國民學校	寶山庄助役、協議會員、青果配銷合作社理事	寶山區	504	
蕭勝和	男	41	國民學校	寶山保甲聯合會會長、寶山合作社監事主席	寶山區	209	
宋枝發	男	27	東京齒科醫學校	開設長春齒科	竹東區	1308	
何禮棟	男	47	京都帝大醫學部	新竹州接管委員會衛生課長、竹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竹東區	855	
蘇瑞麟	男	29	台北帝大文政學部	竹東街助役、興南新聞記者	竹東區	764	
郭福壽	男	44	師範學校	保正、香山區合作社理事、大東公司執行董事	農會	26	
鄭作衡	男	42	泉州私立中學	新竹州商會會長	商會	36	
李克承	男	39	長崎醫大	長崎醫大講師	醫師公會	8	
郭添	男	41	師範本科	國民學校訓導	教育會	83	
康何孔	男	50	國民學校	總工會理事長	總工會	11	
鄭建杓	男	39	岩手醫學專門學校	開設仁生醫院	第一區	119	遞補

資料來源：章子慧編，《台灣時人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台灣省民意機關之建立》、全民日報編，《台灣省首屆參議員名鑑》、陳運棟編纂、張永堂總纂，《新竹市志·卷七

—人物志》、張永堂總纂、張德南編纂，《續修新竹市志下冊—藝文志·人物志》、鄭森松撰，《竹東鎮志—歷史篇》

簡略說明表 3 其中因蘇惟梁在選上市參議員不久後又獲選為省參議員，而同區候補鄭建杓即遞補其空缺，因而將其納入分析。另外表 3 可以分析下面幾項新竹市參議員的性質，如以年齡分布來看，20-29 歲有 2 人，30-39 歲有 5 人，40-49 有 14 人，50-59 有 5 人，60-69 僅 1 人，並且完全無 70 歲以上的市參議員，如此相當清楚地顯示，新竹市參議會正是 40-49 歲正值壯年期的政治菁英當道²⁷，當然，他們仍是敬重 50 歲以上，或是在地方有相當勢力的長者，如議長張式毅與副議長何乾欽正是此類人物。從學歷來看，國民學校畢業有 6 人，師範學校畢業有 8 人，醫學學校有 5 人，法政學科類有 4 人，其他有 4 人，而上述學歷可以得知，這些新竹市參議員幾乎都接受過日本教育，甚至直接前往日本留學者亦不在少數（近三分之一），其中更以師範學校、醫學學校畢業者為大宗，此處亦相當程度呼應吳文星教授所提及：「醫學校及師範學校等已不僅僅是培養專業人才的機關，同時也是孕育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搖籃」²⁸。也可以了解師範學校畢業的「舊師範派」²⁹在戰後初期的地方派系上，擁有相當堅強的實力，而正反映在新竹市參議會的組成。

除上述年齡及學歷分析外，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有下列特質：

一、他們是社會階層，前述分析其學歷，發現他們都受過日本教育，並且為重要的地方領導人，但同時他們也是所謂的地主資產階級³⁰，這可以從他們的經歷看出來，如他們普遍擔任新竹的信用合作社、公司行號、商會監事即相當清楚。

二、是參政經驗，多數新竹市參議員早在日治時期已有參政經驗，不論從層級高的市會議員，或是層級較低的協議會員或是庄長等，這同時也是他們能參選市參議員的資本。從上述特質來看，或許可以推測新竹市參議會的政治菁英們的參政態度較為務實，亦比較關注地方的利益。

27 此與李筱峰統計全台縣市參議員結果大致符合，在全台 734 名參議員中，40-49 歲的人數即有 346 人，約佔 46.5%，而新竹壯年比例則是更高的 51.8%。參見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頁 76。

28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師大歷史研究所，1983），頁 2。

29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頁 100。

30 即受日本教育，與以前讀書人不同類型，受近代教養，能流利使用日語的知識份子。其定義參考：若林正丈著、何義麟、許佩賢等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出版，2007），頁 23。

另外筆者也認同吳乃德與陳明通的觀點，認為政權轉移其實對戰後新竹政治菁英的流動並沒有太大的影響，並給予原本在日治時期擔任較低階層公職的菁英向上流動的機會，但筆者此處更欲強調不同政權下的選舉制度亦值得我們去觀察，即戰後的選舉或許更增添了許多「複雜性」。像日治時期的市會與戰後的市參議會兩者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到市會再向上的層級即是州會，但州會議員的員額亦不算少，³¹但是戰後新竹市參議會再向上的層級即是省參議會，而新竹市省參議會的員額僅後來當選的蘇惟梁一人而已。可以說，若不能當選市參議員，或許會比較少人繼續選省參議員，那他們會流動到什麼地方呢？新竹的行政區域變動又給了新竹的政治菁英一個機會，即他們可以趁 1946 年 4 月 15 日後產生新的區：東、西、南、北、香山、竹東及寶山等七區，而重新選舉區民代表，另外區長與副區長亦經由選舉產生，即戰後的選舉制度或許提供政治菁英們互相平行流動的管道，而非僅是上下流動的關係。

三、新竹市參議會的運作

當所有的新竹市參議員都已確定人選後，新竹市參議會正式於 1946 年 4 月 13 日在市政府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可參照圖 1），26 名議員僅 1 名缺席，更有其他如各區的正副區長、檢察官等其他各界代表出席，而蔣委員長（蔣中正）、陳長官（陳儀）、周處長（周一鶚³²，時任民政處處長）亦發致敬電文祝賀新竹市參議會的成立，而後隨即選舉正副議長人選，即前述張式毅以 15 票當選議長，何乾欽以 21 票當選副議長。成立大會也圓滿結束。³³

31 如以日治時期新竹市會與新竹州會為例，1935 年與 1939 年的新竹市會員額都是 14 名，而同時隔年（1936、1940）舉行的新竹州會員額則是 11 名，兩者相距不遠。參考許淑貞，《日據時期台灣地方選舉與政治參與—以兩次市、州會議員選舉為例（1935-1940）》（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論文，1996），頁 256-284。

32 周一鶚，1905 年生（僅從台灣時人誌推斷），字惠生，福建人。北京高等師範畢業，旋留學法國波亞芝野大學，獲得生物學碩士學位，之後，歷任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及中法大學等校教授。後轉任中央經濟委員會委員、福建省政府委員兼福建糧食管理局局長、國家總動員會議糧鹽組主任、中央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第四組組長，1944 年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成立，陳儀為主任委員，周任委員並兼中央訓練團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副主任一職，目的為培養接收臺灣的人才。1945 年抗戰勝利後，為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延攬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處長，在其任上雖致力於推動地方自治、公民訓練等工作，但爭議仍多。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初，陳儀允其代表政府與民間代表合組委員會，周與包可永、任顯群等參加處委會，處理相關事宜，3 月 26 日長官公署成立二二八事變臨時救恤委員會，由他擔任主任委員一職。參考歐素瑛撰、許雪姬等總策畫，《台灣歷史辭典》（台北：文建會，2004），頁 0430。

33 〈新竹市參議舉成立大會〉，《民報》，1946.4.15 二版。



圖 1：新竹市參議會成立合影³⁴

而後第一次的正式集會則於 4 月 15 日密集展開，連續進行三天，而新竹市參議員該有如何的職責？誠如擔任會議主席的議長張式毅的開會詞（句逗為筆者加註）：

畧以今天是本會第一次大會開幕典禮，對政府於過去數週間繁忙之籌備工作，表示敬意與感謝；次勉全體參議員認清本身職責：為民眾謀福利、為政府推行政令，以不負政府、民眾之期望……³⁵

而當時討論亦相當熱烈，如此次集會即決定各領域的審查委員如下：

民政：何禮棟（召集人）、李克承、李子賢、楊心樂、康阿孔、洪王桂

建設：周宜培、蘇惟梁（召集人）、張國珍、郭福壽、盧阿桶、宋枝發

34 轉載自台灣舊照片資料庫，網址：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detail.jsp?dtd_id=32&id=14508&1&pk=seq&showlevel=2，2012/1/25 瀏覽。

35 陳雲林總主編，〈新竹市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會議錄〉收錄於《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匯編》（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07）頁 376。

財政：陳添登、李延年、鄭作衡（召集人）、蔡欽旺、蕭勝和、蘇瑞麟

教育：曾瑞堯、胡春塘、郭傳芳、駱柳村、郭添（召集人）、蔡福來³⁶

並且進行省參議員的選舉，蘇惟梁以 22 票當選，因而後來即由同區候補鄭建杓代替其市參議員職務。不過雖然不同領域各有不同參議員負責提問相關問題，但或許因第一次集會關係，各參議員各有其關心議題，就其不同類別進行詢問，如一開始即為對郭紹宗市長的詢問，李子賢以及陳添登即提出有關於衛生院院址及院內有關藥品消耗的問題，郭市長則答以院址已有擴充計畫，藥品則是可以透過省衛生局及救濟分署繼續配領；另外新竹第一位醫學博士³⁷的李克承參議員亦提出新藥品的採購價格問題及衛生院院址的建議，可說其就本身的專業進行質詢；而周宜培則質疑要建設工業大新竹，帶日僑技術者被遣送後，是否有人才斷層的問題。可以說基礎的民生問題都是新竹市參議員所關心的。而最為關鍵的財政問題，亦為此次集會的焦點，甚至勞師動眾，共有 11 名議員在第二天會議當晚參與財政的審查，而會議中也提出關於預算的問題，如陳添登連番質疑下列問題：（一）三十四年度的預算不足六十餘萬元，請問要拿什麼財源來填補（二）該年度未收金六十六萬是什麼名目（三）三十五年預算案中補助收入金二千餘萬元有無確實性（四）同年度預算是否要照概算執行？³⁸可以見得陳氏對於財政問題是相當嚴格地替市民把關。而糧食問題此類最基礎的問題亦被提出，如鄭作衡希望致電台灣糧食調劑委員會撥糧以新竹為優先考慮等。第一次的市參議會經三天，但議員們一點也不馬虎，共推行二十幾項的議決，可說獲得相當多的成果！

不過隨著民生經濟的問題惡化，這些政治菁英們亦必須傳達人民的聲音，並試圖能努力改善這樣的狀況，如為二二八事件的背景之一即是米價的問題，這同樣也出現在新竹，如民報的報導提到：「台北每斤十三元七角的在來米，本市（新竹）十四元四角，總觀本省的米價，可知本市站在最高的段階了。」³⁹雖然該報導並非一定能完全反映這樣的米價，但至少可以知道當時新竹米價問題的嚴重。對此問題，同樣陳添登認為應向省糧食局及新竹支所提出，新竹並非產米的區域，希望能輸入其他區糧米，補充新竹不足並抑制米價；⁴⁰而郭傳芳則是認為餘糧登記需要徹底，公有米當以最低價格，配給糴米階級，以期達到口

36 〈新竹市第一次參議會〉，《民報》，1946.4.19 二版。

37 關於李克承生平可參考陳運棟撰、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頁 182-183。

38 〈新竹市參議會最終日〉，《民報》，1946.4.21，二版。

39 〈新竹市平糶怪現象，副作用反刺激米漲〉，《民報》，1946.11.17，四版。

40 〈追究平糶米舞弊，責備股長巫山戲〉，《民報》，1946.12.5，四版。

案分糧；⁴¹

鄭作衡則是提及糧食局對換發的粟價竟比市價還高出兩成，須以市參議會名義據理力爭！可以見得市參議員對於米價的看法與努力。

但是隨著戰後以來，政治、經濟各種措施的弊竇叢生，終仍引發了二二八事件的產生，不過這些新竹的政治菁英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新竹的情況如何，下面則再簡述新竹二二八的狀況：新竹市離台北市亦近，故民眾獲知台北慘案後立即響應，在 3 月 1 日即發生毆打軍人事件，並揚言欲燒新竹市政府，但未有行動。但在 3 月 2 日則除了毆打外省人外，同時進攻法院、市政府等機關，新竹市長郭紹宗為求自保，出動警察及憲兵鎮壓，因而發生了「旭橋事件」，多數無辜民眾遭到機槍無情掃射。民眾打算再進攻警局，但幸得市參議會調停，並要求六點：（一）外省人對此次損失不再要求賠償（二）參與此次暴動者准予免責（三）縣市長即行民選（四）警察武裝即行解除（五）駐軍撤離市區（六）停在本市候車之軍隊不要增援台北。而郭紹宗答覆（一）（二）可照辦，（三）（四）需有陳儀命令，（五）（六）請民眾自行向軍隊交涉，市府無權過問。因而雙方暫時妥協。⁴²同時在當晚，市參議員召集各界人士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新竹市分會」於新竹中學，並決定派代表赴台北參加 3 月 6 日處委會的集會。其中民眾發言熱烈，主要要求市長設法解除糧荒並安置失業者，並且具體提出：（一）嚴懲開槍者（二）駐軍退出市區，但郭紹宗都沒有具體回應。⁴³

後來五日下午，處委會再度在新竹中學開會，以在 6 日時提出其要求，要點如下：（一）關於本事件，公署要負全責（二）縣市長民選即時實施（三）公署秘書長由本省人選出，各處長及重要幹部與委員，半數以上應以本省充之（四）一切公營改為民營（五）專賣事業、貿易局等即時廢止等。後 6 日晚上，處委會為了解決糧荒問題，派代表赴中、南部採購。⁴⁴另外當日蘇紹文（時為新竹防衛司令部司令）亦發布公告，禁止民眾集會遊行、演說；禁止打造、隱藏武器；禁止妨礙部隊行動；禁止竊盜軍警武器；禁止侵入步哨警戒線，人民不得妨礙政府機關辦公。⁴⁵而處委會原訂於 12 日舉行民選市長大會，但處委會已於 10 日被陳儀宣布為非法組織撤銷，而改於 12 日下午舉行參議會臨時會，推舉陳貞彬為新任市

41 〈計畫多屬空中樓閣，需要衡量財政才可〉，1946.12.6，四版。

42 〈新竹市政府發電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呈報 3 月 2 日事件經過函〉收錄於張炎憲等著，《新竹風城二二八》（新竹：新竹市政府，2002），頁 244。

43 張炎憲等著，《新竹風城二二八》，頁 4。

44 吳密察撰、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首（下）—史略》，頁 107。

45 張炎憲等著，《新竹風城二二八》，頁 16。

長。而陳氏其原為主任秘書，相當清楚新竹之狀況與郭紹宗施政之不得人心，因此拒絕 21 師任意槍決本省分子並禁止外省籍市府職員報復，可以見得其寬大，這也是新竹得以傷害減少的原因⁴⁶。

不過上述二二八事件中，新竹市參議員也因參加處委會而有相當的麻煩，如陳添登竟被認為是台獨的分子，被憲兵所拘押，所幸後經交保釋放：鄭作衡、李子賢、鄭建杓亦同陳添登遭遇。而竹東的宋枝發亦被逮補。上述參議員幾乎都能被逮捕後而能釋放，與同為新竹人的蘇紹文作保相當有關，新竹人亦十分推崇蘇紹文，這樣感念的情緒從當年的選舉蘇紹文以高票被推選為新竹的國大代表亦可想見⁴⁷。因此新竹市參議會的菁英們可說幾乎是安然無恙的，也是新竹市參議會菁英流動率低的原因。

不過在歷經二二八事件後的新竹市參議會狀況如何，由於受限於報紙上的史料，其報導幾乎以行政官員的報告為主，非如二二八事件以前，民報記者相當關注市參議員的表現，或許這樣報導風格的轉變，亦是台灣人對於政治轉趨保守的風向球吧，筆者暫時不以此為討論。但也因此較未能得知新竹市參議員是否較二二八事件前保守，不過以陳添登為例，他仍然相當關注財政問題，像他曾問到對於台灣銀行借款五千萬元，未知其用途計畫進行如何，不過市府官員並未明確答覆：李克承及郭福壽也有詢問有關電影放映及教育方面問題。⁴⁸另外市府欲執行的相關事項，參議員們亦熱烈討論，多數案件照市府提案通過。⁴⁹因而筆者僅能做如此的推斷：陳貞彬取代郭紹宗為新竹市長後，其行政團隊施政能力或許較郭之團隊更勝一籌，而能應付市參議員的詢問或建議，不致如郭紹宗之行政團隊有相當的花邊新聞⁵⁰，也較少看到行政官員尷尬的狀況，參議員們也較多針對施政事項作相關討論。

另外，對於實行三七五減租的態度，以下從張式毅其中的發言或能推敲：

本省自陳主席接長省政伊始，即以「民生第一」為治台目標，實行改革幣制，勵行

46 張炎憲等著，《新竹風城二二八》（新竹：新竹市政府，2002），頁 4。

47 在 1947 年的國大代表選舉中，在有效票 39,057 中，蘇紹文竟獲得了 24,807 票，佔 63.5% 的票數，可見其聲望之高。參考王崑義撰、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選舉志（下）》（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頁 696-697。

48 〈新竹市參七次大會第二日〉，《民聲日報》，1948.4.8，二版。

49 〈新竹市參七次大會第三日〉，《民聲日報》，1948.4.9，二版。

50 如陳添登曾詢問第二股長與女辦事員竟在防空洞演桃色巫山戲，市論囂囂，有何處置？而市長也僅能將其撤職。參見〈追究平糶米舞弊，責備股長巫山戲〉，《民報》，1946.12.5，四版。甚至財政科長本身亦因為新聞報導其貪汙與娶姨太太，竟欲責怪參議員要求其負責。可見郭之行政團隊本身的私德或許即有相當問題。

「三七五」，可謂本省有史以來的大改革，由此人民生活暫時改進，得以安居樂業，但我們應更加努力擁護陳主席的新經濟政策。⁵¹

或許可看出市參議會表面上至少是擁護政府的政策，不過對於另外一項政策則是持反對立場，即是 1950 年即將實行的「地方自治」，如對於行政區域劃分情況討論熱烈外，各議員均極力反對新竹縣市區域劃分為二縣制，一致主張為一省轄市二縣制，並推正副議長、陳添登、李克承、郭傳芳為代表至省陳情。⁵² 不過，仍無法改變新竹市降格成為縣轄市（新竹縣市合併，縣治設於新竹市）的命運，要直到 1982 年新竹市才恢復成省轄市地位。⁵³

四、結語

從剛開始對於選舉的觀望，甚至民報刊載著：「新竹市參議員候選人寥寥，只一個聲請登記」⁵⁴，並且記者不希望「新竹候選人在觀望形勢」⁵⁵，到最後卻暴增出 80 個以上候選人，並且積極參與市參議會的討論，雖然可見新竹菁英們的落差，但他們仍展現出其積極性，努力替新竹市民把關，關注最為基礎的民生問題，雖然二二八事件同樣造成了許多市參議員的困擾，但幸得蘇紹文解救，使得他們倖免於政治迫害，生命能夠延續，並且繼續為新竹市民服務，這不僅是新竹市民的福氣，也是新竹菁英們比與其他地區慘遭遇害的菁英幸運的地方。

不過，筆者一開始提及的政治現代化，新竹的政治菁英是否能有這樣的概念呢？我們可以從他們在參議會其中一次的表现來觀察。有一位徐財政科長這樣提到：

對三十四年度的戶稅征收情形，因前任者交代不清，惹起諸位很大關心，議員要求勘查，本人無任歡迎，可是昨天新竹新報，刊登本人貪汙娶姨太太的記事，本日上午某議員也說本人貪汙，要求三日內各要提出證據，不然似此公理毀謗，一定訴諸法庭云云。⁵⁶（議

場一時騷然）

李子賢則回擊：「議員在議場的言論，法律上不負任何責任」，但財政科長又回：「攻擊私人，當然要負責」這時陳添登說：「科長是公人不是私人，不該把新聞記事提來議場責問議員，分明是無視二十六名代表，請議長將參議會休止！」李克承則說：「這是恐喝（嚇）議員（議場空氣，非常險惡，殆已陷於不可收拾）」不過最後仍由張式毅以議長身分打圓場，提到議員在會議中對議長或辦公員的批評當然不犯法律，並請徐財務科長取消言論。雖然此次會議最後不得而知其結果（議員又惹怒記者，導致記者退場，無後續報導），那到底法律又是如何規定呢？根據〈市參議會組織條例〉第十八條：「市參議會在會議時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外不負責任。」⁵⁷ 因此，可見得除了李子賢本身為律師而具有其法律專業外，陳添登與張式毅可說表現了他們嫻熟法律的一面，並且由李子賢與陳添登堅持他們是依據法律與公務的立場，也可以知道他們其實已經符合政治現代化之中權威理性化的部分，他們是遵守法律的，並將權威交給法律；而非如那位財務科長，任意遷怒議員，而顯現其對於法律的無知。

總之經由前述章節的分析，筆者認為政權轉移雖然對戰後新竹政治菁英的流動沒有確切影響，也讓原本擔任較低階層公職的菁英能向上流動，但此處筆者重新強調不同政權下的選舉制度，即戰後的選舉更可能增添了平行流動的「複雜性」。並且可以值得我們在注意的是，新竹的政治菁英們並未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而從政治及生命舞台消逝，他們能繼續的為新竹市民發聲，實是其「特殊性」所在。不過本文尚未處理的是，若他們持續在政治舞台活動的話，又會有什麼樣的遭遇，是否有些人歷經二二八之後真的不再出來從政，還是他們有可能演變成地方派系的要角，都是可以在為文討論的問題，此處筆者想重新提醒的是，他們在 1946 年到 1950 年這樣動盪的時代，能夠為民喉舌，並且重新建設戰爭受創極重的新竹，我們可以對這些新竹市參議員在這段時間的努力給予敬意與肯定，他們不該是被歷史所遺忘的。

徵引書目

一、史料

1. 《民報》，1946-1947

57 內政部民政司，《各級民意機關法規註釋》，1946。

51 〈新竹市參大會揭幕，討論劃分行政區域，各議員反對劃為二縣制〉，《民聲日報》，1949.09.16，四版。
 52 同註 48。
 53 新竹沿革，參考新竹市政府網站，網址：http://www.hccg.gov.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19722&FP=D40000001852000000_0，2012/1/25 瀏覽。
 54 據報導，僅郭傳芳 1 人申請，參考〈新竹市參議員候選人寥寥，只一個聲請登記〉，《民報》，1946.03.24，二版。
 55 〈新竹候選人在觀望形勢〉，《民報》，1946.03.24，二版。
 56 〈新竹候選人在觀望形勢〉，《民報》，1946.03.24，二版。

2. 《民聲日報》，1948-1950
3. 內政部民政司，《各級民意機關法規註釋》，1946。
4.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編，《台灣民政第一輯》收錄於《民國史料叢刊》119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5.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編，《台灣省民意機關之建立》（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1946）
6. 全民日報編，《台灣省首屆參議員名鑑》（台北：全民日報社，1951）
7. 章子慧編，《台灣時人誌》（台北板橋：龍文出版社重印，2009）

二、專書

1. 王崑義撰、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選舉志（下）》（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
2.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師大歷史研究所，1983）
3. 吳密察撰、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首（下）—史略》（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
4. 呂亞力，《政治學：從權力角度之政治剖析》（台北：台灣東華，2008）
5.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1986 初版、1987 三版）
6. 林水樹纂修、黃旺成監修，《台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五政事志—第一冊地方自治、行政》（新竹縣：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7）
7. 若林正文著、何義麟、許佩賢等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出版，2007）
8. 張炎憲、高淑媛，《混亂年代的台北縣參議會》（台北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6）
9. 張炎憲等著，《新竹風城二二八》（新竹：新竹市政府，2002）
10. 張德南編纂、張永堂總纂，《續修新竹市志下冊—藝文志·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2005）
11. 許雪姬等總策畫，《台灣歷史辭典》（台北：文建會，2004）
12. 陳運棟編纂、張永堂總纂，《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
13. 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圖書，1982 初版、1987 三版）
14. 潘國正撰、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首（下）—大事紀》（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
15. 鄭梓，《戰後台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台中：著者自刊，1993 增訂版）

16. 鄭森松撰，《竹東鎮志—歷史篇》（新竹縣：竹東鎮公所，2005）

三、學位論文及期刊論文

（一）學位論文：

1. 王御風，《近代台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1920—1960）》（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2. 許淑貞，《日據時期台灣地方選舉與政治參與—以兩次市、州會議員選舉為例（1935-1940）》（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論文，1996）。

（二）期刊論文：

1. 何義麟，〈自治的理想與實踐—戰後初期台灣自治運動之轉折〉收錄於《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第七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4），頁 225-261
2. 吳乃德、陳明通，〈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收錄於《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頁 351-385。
3. 吳密察，〈台灣人的夢與二二八事件—台灣的脫殖民地化〉收錄於《當代》第八十七期（台北：當代雜誌社，1993），頁 30-49
4. 鄭志敏，〈從「市參議員」到「悽慘議員」—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收錄於《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9），頁 393-459。
5. 鄭梓，〈中央政府遷台初期開創「半自治制」之歷史探源〉收錄於《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四冊》（台北：近代中國，1995），頁 420-460
6. 鄭梓，〈戰後台灣行政體系的接收與重建—以行政長官公署為中心之分析〉收錄於《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頁 233-272
7. 蘇瑤崇，〈「終戰」至「光復」期間台灣政治與社會變化〉收錄於《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三期（台北新店：國史館，2007），頁 46-87。

四、網路參考資料：

1. 台灣舊照片資料庫，網址：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detail.jsp?dtd_id=32&id=14508&1pk=seq&showlevel=2，2012/1/25 瀏覽。
2. 新竹市政府網站，網址：http://www.hccg.gov.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19722&FP=D40000001852000000_0，2012/1/25 瀏覽。